

四川省图书馆学报丛刊



类书的沿革

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编

1981

类书的沿革

戴克瑜 唐建华 主编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编印

一九八一年春

目 次

一、类书的概念及特点·····	(1)
二、类书的起源和《皇览》的产生·····	(5)
三、齐梁时期的类书·····	(16)
四、唐、五代时期的类书·····	(20)
五、宋、元时期的类书·····	(35)
六、明朝时期的类书·····	(60)
七、清朝时期的类书·····	(80)
八、结论·····	(97)
九、现存类书书目 ·····	(105)
后 记·····	(116)

一、类书的概念及特点

“类书”这个名词起源于《新唐书》，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了。由于过去人们对它的概念不清，很多目录学家都曾将类书列入了不同的类目。例如我国最早的一部类书《皇览》，晋荀勖的《中经新簿》将它列入了史部。后来，《隋书经籍志》又将它复列入子部杂家。到了《旧唐书经籍志》时才另立类书一目，叫做类事类，但仍归子部。直自《新唐书》始起，才改类事为类书。类书才因此而得名。

类书产生以后，给分类学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它并不属于经、史、子、集的任何一类，勉强把它归入史部或子部都多有不当。因此，后来不少分类学家都主张打破旧的分类框子，给类书另立一个门类，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宋郑樵在《通志》中把类书单独列为一类，主张类书独立。后来清代学者孙星衍撰《孙氏祠堂书目》，也将群书分为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十二个大类，类书亦被单独列为一类。但也有人主张将类书列入四大部分类法【所谓四部分类法，即用甲、乙、丙、丁四部来总括群书，为晋武帝咸宁年间（公元二七五——二七九年）秘书监荀勖所创。甲部，纪经、小学等书；乙部，纪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家、数术；丙部，纪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纪诗赋、图籍、汲冢书。荀勖所定的甲、乙、丙、丁四部秩序，是经、子、史、集。东晋时李充将子与史的位置互相调换，使甲、

乙、丙、丁成为经、史、子、集的顺序。唐初修《隋书经籍志》时，便直标经、史、子、集四部之名，来代替甲、乙、丙、丁的称号。自此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行之达一千余年之久】四部的末尾，或者将各种类书分别列入故事、总集、杂家三类。总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统一的见解。

为便于研究起见，我们认为必须首先给类书下一个较为确切的定义。什么叫类书？我们认为，凡采辑群书，全面系统地收集某科、多科或各科知识，经加工整理，以类相从，标明出处，条分件系，为便于人们翻检知识和资料的工具书，称之为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类书类叙中也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类，无类可归。”中国历史上所出现的许多类书，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它是我国工具书的一种主要的类型。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便可把类书同其它的书籍严加区别了。首先，它与文总集有别，因为文总集是将各家不同体裁的文章加以收编而成的书籍。其次，它与政书也有所不同，凡汇集各朝代的典章制度的书籍列入政书，如《通典》、《会要》等。最后，它与丛书也区别开来了，凡汇集各种古书给以总名的列入丛书，如《百川学海》等。至于它与字典、词典的关系，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类书可以说是在字典、词典发展过程中分离出来后独立发展起来的。我国类书与百科全书相较，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我国古代类书都是编纂者根据封建君王的“圣意”，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广征博采资料，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以类相从，并用这些材料来表达统治阶级对某一事物的观点和态度，并不加入编撰者的主观论断。如清代

学者陈元龙所编纂的《格致镜原》一书，四库提要说：“每物必溯其本始，其采摭极博，而编次具有条理，首尾串贯……”。并反映出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参考价值。

第二、我国类书所收集的资料，一般都注有原文出处。如以张英等所编之《渊鉴类函》作例，全书共分四百五十卷四十五部，每一部都先纪释名、总类、沿革或缘起，然后纪典故及对偶，再次为摘句，末附诗文，并详注出处。而百科全书只是对所列条目加以全面论述，但并不标明其所征资料的出处。

第三、我国类书所依据的都是第一手的原始文献。如现存的汜胜之所著之古农书《汜胜之书》，就是从《太平御览》中辑佚而成的。再如清代集古代典籍之大成的《四库全书》，也曾经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三百八十余种等。百科全书多系第二手的资料，它是一种论述性的书籍，它为人们提供比较广泛或专门的知识。

第四、从编排的结构上来看，类书有按类排比的。这种排列法是按类分为若干部门，每部门再分若干目，每目下先录书名，次录材料，按先后顺序组织。其部类名称叫“编”、“典”、“门”，如《太平御览》、《古今图书集成》等是。也有按音韵编纂的，如《佩文韵府》、《永乐大典》等是。从体例上看，可分兼收若干类和专收某一类的两种类书，而以前者居多。总之，类书的分类是相当繁杂的，而且在书后都未附有索引，使用者大都要依靠书前的类目进行检索。而不同的类书又具有着不同的功用。有些类书是用来检查事物之掌故事实的，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白孔六帖》、《初学记》；宋代的《太平御览》、《册府

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唐类函》，以及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等。有些类书则是用来考查事物之起源的，如宋代的《事物纪原》，清代的《一是纪始》、《格致镜原》、《称谓录》等。另有一些类书又是专门用来检查文章词藻的，如宋代的《事类赋》，清代的《渊鉴类函》、《佩文韵府》、《骈字类编》、《子史精华》等。还有一些类书是被用来检查岁时典故的，如唐代的《岁华纪丽》，宋代的《岁时广纪》，清代的《月令粹编》等等。我们只要掌握了各种类书的特点和不同功用，就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查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资料。

二、类书的起源和《皇览》的产生

我国古代类书是源远流长的。早在姬周末年（公元前五五八年），研究《春秋》【《春秋》原来是一部编年史，各国都有，故墨子说见过百国《春秋》。这里所说的《春秋》与后来孔子根据鲁国《春秋》所撰之《春秋》不同。】的学者，就已经做过文章资料的抄撮工作。他们把许多重要的史实汇集起来，以便利阅览。可惜这些书籍早已亡佚，对它的结构无从稽考。但我们可以作这样一个推论，这种《撮抄》之书已是类书的萌芽了。刘向《别录》上有这样一段记载：“《左氏传》三十卷，左邱明授曾申，申授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引）。

后来，孔子编纂成《春秋》，其目的在于严格辨明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等级名分。【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左邱明撰就《左传》，别称《左氏春秋》（公元前四世纪），对《春秋》所记春秋时代各国的重要史事，用编年体补充了许多具体史实。《春秋》和《左传》都是统治阶级的教科书，是“万古不变”的经典著作。但是，《春秋》和《左传》都是卷帙浩繁，内容宏博的巨著，为了便于人们把握它的精髓，当时不少学者对这两部著作作了抄撮的工作。所以司马迁的《史记》也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

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乃是对一种书的抄撮。

当时儒家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儒派的典籍教条也特别多，【他们的经典著作总起来说有六经，即《周易》、《尚书》、《诗》、《礼》、《乐》、《春秋》】因此曾有人这样说：

“儒家经典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理”。而儒家学派为要实践自己的那一套理论，为统治阶级出谋献策，并击败自己的论敌，就必须迅速从自己的典籍中组织自己的观点，以期取得胜利。所以，这种“抄撮”之学就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工具了。尽管如此，这时还没有也不可能出现体例完整的类书，因为作为工具书的一种类型的类书，是社会物质生产和文化典籍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春秋、战国到秦的统一，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秦始皇不仅建立了一个空前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还在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各方面，做了不少统一的工作，从而为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时有丞相李斯继周时《史籀》而作《苍颉》七章，车府令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等。这些据《史记》【西汉司马迁著，记述从上古（黄帝）到汉武帝时的史实。《史记》为记传体史书之祖，也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伟大通史】的考证，都是当时教学童的书籍。汉人曾把这三部字书合而为一，统称《苍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共五十五章。

《汉书艺文志》也说：“史籀篇者，周时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

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我们从它们的编制结构来看，多是按事物门类分别部居，收罗极广，可供人们“缓急可就而求”。其发展趋势则是分类的字典、词典和类书两个方面。

后来，由于秦统治者对人民实行残暴的刑罚，严重的徭役，结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的巨浪冲垮了秦朝的封建统治，并为盛大的汉朝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汉高祖刘邦吸取了这次农民运动的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了许多让步的政策，宽刑罚、减赋税，使人民能得以休生养息的机会。据载，当时有“肖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的事情。这样，经过了数十年之后，在农民辛勤劳动和努力的基础上，使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在工业上有煮盐、冶炼、铸钱之兴起，在农业上有超过耒车的创造，在科学上有张衡的地动仪之发明。汉初的统治阶级还在全国各地广兴水利，致使关中六渠沃野千里。政治的相对统一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孔子，专以儒家思想教育人民，致使儒家学派逐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这时，经史文学也有了很大的创建，工具书也象雨后春笋一样发展了起来。其中有的工具书与类书颇为相近，如武帝时司马相如所著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摹仿司马相如所撰的《急就篇》等。《急就篇》乃是《凡将篇》的扩大，上面有这样几句话：“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属，用目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急就”就是根据开头两个字起名的。从这段叙述可见，编者的目的是为学童编制的识字课本。“急就”的意思，晁公武

《郡斋读书后志》卷一说：“急就者，谓字之难知者，缓急可就而求焉。”但是，这部书既非字典，亦非类书。后来的字典只收单字，而《急就篇》兼收人名、地名、杂物、词语，以类相从。例如它把桐、梓、枞、榆、椿等木类的字放在一起；把凤、爵、鸿、鹄、雁、鹭等鸟类的字放在一起。这种按类排列的方法，不仅可供学童识字，也能给学童以一些常识。因此，它又与类书颇近似，但并不算是类书。后来唐人颜师古曾给该书作注，宋王应麟又为它作补注，使它成了一本兼字典、词典、类书之用的工具书。

以上便是类书产生的远源，都是儒家解释经典，教育童生而编制的一些有可能发展成类书的字书。而类书的直接产生却不是儒家，因为类书所搜集的并不是一家一派，而是各家各派的学说，因此类书的产生和杂家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

所谓杂家，就是融合儒、墨、名、法而自成一家。杂家的最早著作是《吕览》。【《吕览》又称《吕氏春秋》，为战国末年秦国丞相吕不韦的门客所撰写。内容以阐述儒家学术为主，但范围广杂，书中所记历史故事甚多，保存了不少战国以前的史料。】《史记》上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

后来，汪中代毕源为《吕氏春秋》所作的序中说得更明白：“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其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说兼有之。故《劝学》、《尊师》、《诬徒》、《善学》四

篇，皆教学之方。与《学记》表里；《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皆论乐，……凡此诸篇，则文艺之遗文也，十二纪发明明堂礼，则明堂阴阳之学也；《贵生》、《情欲》、《尽数》、《审分》、《君守》五篇，尚清静养生之术，则道家【道家的首领为楚人李耳，著有《道德经》一书，号称老子。道家学说比儒家更反动，主张把社会拉回到“结绳而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古社会。】流也；《荡兵》、《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八篇，皆论兵，则兵权谋、形势二家也；《上农》、《任地》、《辨士》三篇，皆农桑树艺之事，则农家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乱》、《禁塞》、《大乐》三篇以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墨家的领袖，他主张“兼爱”，反对战争，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刻勤刻俭，代表了下层社会农工奴隶当时的要求。在研究的方法上，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辩证法的因素。】非攻教守及非乐为过，而《当染篇》全取墨子，《应言篇》司马喜事，则深重墨氏之学。……司马迁谓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然则是书之成，不出一人之手，故不名一家之学，而为后世《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之所托始。《艺文志》列之杂家，良有以也。”

可见，《吕氏春秋》是集集中了持有不同观点的学者三千多人编成的一部达二十多万字的巨著。它包括文学艺术、政治军事、教育、农业以及各家各派的主张，这确实具备了类书的规模，给后来编纂类书的人以莫大启示。如果将它加以改造，就可成为一部类事之书，故汪中才说它是后来《修文御览》、《华林遍略》一类的类书的依托。而从《吕览》的内容和吕

不书的思想来分析，却属杂家者流。

继承《吕览》的要算《淮南子》。【《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撰著。全书共二十篇，第二十一篇为《要略》。汉许慎解释说：“凡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说明刘安在《要略》里叙述了自己著书的意旨，各篇大意及相互关系。这种提要钩玄，概括全书的自我介绍，对读者有极大帮助。】据历史记载，它的创作过程是这样：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是一个酷爱文学的人，那时持有各种观点的学者都在他那里作食客，于是他便与门下宾客苏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和儒家大山、小山作淮南内篇二十一篇，外篇十九篇。高诱在为该书作注时说：“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高诱注书序》）。黄震也说它：“会粹诸子，旁搜异闻以成之。凡阴阳、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蛮之远，昆虫草目之细，瑰奇诡异，足以骇人耳目者，无不森然罗列其间，盖天下类书之博者也”。（黄震《日钞》卷五五）认为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类书。特别是钮树玉从该书的性质上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他说：“类书之端，造于《淮南子》。古者著书，各道其自得耳，无有裒集群言，纳于部类者。秦之吕不韦，始聚能文之士，著为《吕览》，而其言则自成一派，且多他书所未载，非徒涉猎也。至《淮南》一书，乃博采群言，分诸部类，大旨宗老、庄而非儒、墨，虽泛滥庞杂，醇疵互见，而大气浩汗，故能融会无迹，则探索之力亦深矣”。即是说，这部书是收集了各方面的学说，按类排列，为类书之开端。我们看一看今天还保存下来的《淮南子》一书，便可发现该书遍收了《文子》、《吕氏春秋》、《庄》、《列》、《邓析》、《慎子》、《山海经》、《尔雅》各书的言论，

以及当时刘安所召食客的观点，甚为广博。从其体制上来看，也已初具了类书的一些特点。但，它是阐明观点的论述性文章的汇集，而并非供人们检查资料的工具书，所以严格说来也还不能算是类书。不过，如果仅就从收集和保存各家各派的言论这一点来讲，却又起着类书的作用，特别是对后来类书的产生，实有着巨大的影响。

西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时期。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发展了大地主的庄园经济，它是一种自给自足形态的自然经济，是封建割据的经济基础，它造成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政权的对抗局面。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势，更加疯狂地对农民进行经济盘剥和政治压迫，从而激起了西汉末年绿林、赤眉、铜马和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尽管这些农民革命运动都被王公贵族们残酷镇压下去了，但西汉和东汉的封建皇朝却也因此而覆亡，代之而起的则是连年无休止的军阀混战。这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中央与地方、外戚、宦官、大官僚之间的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都异常尖锐化了，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则是今古文经学派的斗争，王充的唯物主义与当时统治者的“三纲五常”迷信经纬之说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推动着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成、哀之间，目录学鼻祖刘向父子之校书和整理古籍，并首创《七略》【虽然《七略》早已亡佚，但根据班固所著《汉书艺文志》中的门类条例，亦可得见《七略》之类目详项。六艺略：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略：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兵书略：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数术略：天文、历谱、五

行、著龟、杂占、形法。方技略：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将当时政府所藏的书籍，按学术的源流，书籍的性质，各归其类。灵帝时，提倡词赋、小说、绘画、书法等，都是当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反映。

自西汉至曹魏，在文体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以单行的散文为主，进到以排偶的赋体为主。作赋的人都是广泛地穷年累月的收罗词藻，经过精心的安排，方成篇章。班固的一两都赋（《西都赋》和《东都赋》）即是宏篇巨著。它文辞繁富，但却没有骨力。因此，张衡对它极度鄙薄。后来，经过他“精思博会”，花了十余年的心血，写出了《西京赋》和《东京赋》及《南都赋》，比班固写得更为宏大。到了西晋太康年间，左思又作了《三都赋》。《晋书》说他：“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这些赋都是经历三年或十年才写出一篇，赋中将风土、物产、山水、鸟兽、草木等都加以穷搜博采，精心构思写出。书一旦成，便轰动一时，人们都不惜精力，争相抄写，以致闹得“洛阳为之纸贵”。“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袁枚《历代赋话序》。）

这些赋与其说是赋，不如说它是一本搜集了各类词藻的具有类书的特点的书籍更恰当一些。但是，它毕竟不是一本结构谨严，组织有序，专供人们翻检用的类书，而仍然只不过是一篇长赋而已。不过，文学家要写这样的赋，如果他的手边有一本完善的类书，也将用不了三年或十年那么长的时间就可编成。所以，这样的赋是当时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不但对类书这类工具书提出了社会要求，而且也给类书的编制提供了条件。因此，魏文帝时的类书《皇览》也就应运而生了。

西汉时，文体大都是单行的语句，到了东汉，单行语句和排偶句的文句却并驾齐驱了。到了曹魏建安年间，特别是“建安七子”的文章中，就完全用排偶句代替了单行句的文体，无论是韵文或非韵文一律是骈偶文，这样便形成四六骈文的极盛时期。于是，一般文人都追逐词藻的华丽，一句话变成两句话表达出来，与那种靡曼纤冶，和西汉时的简炼朴实全然两样。这些骈文里面充满了典故排比，文人们竞相收集典故，以谁记诵典故最多而受人称道。荀悦、曹植等就是当时最受人们津津乐道的人物。当然，一个人的记忆力毕竟是很有限的，即或强记硬背一时，终不免于遗忘。为了与遗忘作斗争，只有靠平时努力广泛收集，并巧妙地安排这些资料，以备写文章时迅速翻检和查考。这种广泛收集资料，经过精心安排，便于人们寻检资料的书籍也就是类书。

赋体流行之际，则抄撮之风更盛。最初抄撮的还只限于历史资料方面。如《隋书经籍志》上说：“自后汉以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或起自人皇，或断之近代，亦各其志”。后来发展到对经、史、子、集各方面的钞撮。据统计，这种钞撮之书不下五六十种，都是三国六朝人所作，而三国时期特别盛行。魏蜀吴三国的情况都差不多，在曹魏方面，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著有《兵书节要》，系收录古兵书抄摘而成的。蜀统治者为了着自己的需要，也曾作过《申》、《韩》、《管子》、《六韬》等的节要。《吴志》上也记载阚泽在十分穷困的情况下，为他人卖书，所得之钱全用来买纸，从事这种抄撮工作。

类书资料的搜集是异常广泛的，因此，要编著一部巨量的无所不包的类书，绝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及的。它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并且还需要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作保证，

同时还要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支持。三国时期，魏最强大，曹魏除实行屯田制度以外，还兴修许多河渠，开辟稻田，募民耕种，一岁得谷百万斗。据说曹操是十分重视农业的，有一次行军，经过麦田，乃下令：损坏麦田者斩。不料他自己的马跃入麦中，操乃拔剑割发以示处罚。他还严禁豪强兼并，规定人民纳田租每亩四升，每户出绢二匹，棉二斤，不许额外多取。因此，曹魏也就一天天强大了起来。同时，曹氏父子又特别喜好文学，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大批文人儒士，在文学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历史上故有“建安文学”之称。魏文帝曹丕凭借行政力量，聚集大批文人编就了《皇览》一书。所谓《皇览》，顾名思义就是给皇帝老官看的。从此，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全定型的类书诞生了。往后历代的学者都认为它是我国类书的开山鼻祖，是“千古类书的权舆”。《四库提要》卷一三五吴淑《事类赋》提要也说：“类书始于皇览。”

从历史记载来看，《皇览》的作者有名可数的就有六七人之多，王象、刘劭、桓范、缪袭、韦诞等人都曾参加过《皇览》的编辑工作。据《魏志·文帝记》上也说：“……帝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又使诸儒撰集经传，随类相从，凡千余篇，号曰《皇览》”。它的篇幅是很大的，《魏志》《杨俊传》注魏略记载说：“王象受诏撰《皇览》，使象领秘书监。象从延康元年始撰集，数岁成，藏于秘府，合四十余部，部有数十篇，通合八百余万字”。（《二十五史补编》《三国艺文志》精装（三）第七十五页）。可见，这是一部内容繁富，按类编排的长达几百万字的类书。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凭着手抄很难保存，所以到现在这部类书早已经不存在了。据载《皇览》在